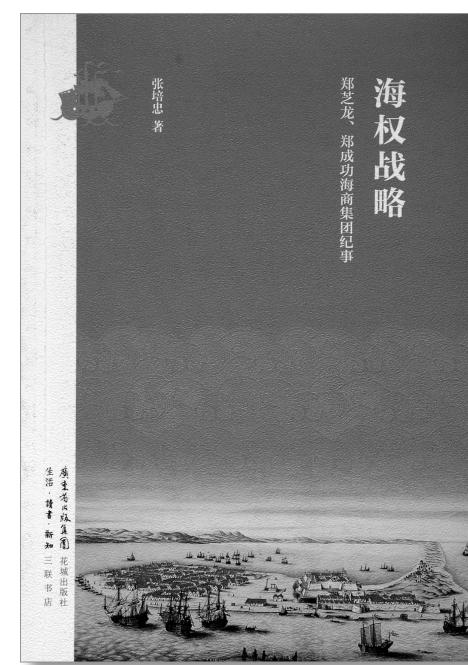




报告文学《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 一部中国微缩版的 海权文化“教科书”

□何建明



对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有多么的重要。有人常说，我们不谋取霸主，研究海权有什么意义？须知这不是敢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实力不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研究海权，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外国总是在担心我们会称霸，我们的崛起会对人家有威胁，我们的领导人也总是宣称绝不称霸。问题是，我们的海上实力有多硬气？最近的马航事件，一个飞机从地球上空突然消失，至今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现。马航搜救全球参与，这实际也是一次间接检验各国海上实力的时刻。在和平时

代，海权已不只体现在如郑成功年代那样谁驱逐谁的战斗，也是体现在一国在海上的综合控制力和运用力。没有多么宏大，一些微观的事就能体现出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努力的还很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好，实现中国梦乃至海洋强国梦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强调海权，在于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各方面的重要意义。如今很多国与国的地缘政治又以海洋、海权为最终代表，对于重要的深水良港、关键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重大的海峡、海湾，哪个国家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力，哪个国家就掌握了发言的话语权，自然而然也就提升了政治资本和政治身价。而且，如今重要的能源战略物资的运输，都要通过海洋来实现，比如海上石油交通要道、海面以下的管网输送等，都要牵扯海洋本身的资源占有，要想经济发展必须海洋发展，海上的石油天然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如今的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都与经济利益攸关。至于安全，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延伸距离最长、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

再回到这本书，《海权战略》讲的是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以史为鉴，它的价值不仅是警示海权“意识”，更重在海权“战略”。郑芝龙海商集团与明朝官方几经周旋后接受招安，他的身份在海盗、海商、官军三者之间变换，左右逢源，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郑成功军队每年总支出400万两银子，海外贸易收入250万两。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而料罗湾海战更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间竞争的规律——制海权决定商业贸易权。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

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就如同内陆农耕社会里，强大的陆军是生存的必要投入一样。1655年郑成功下令对台禁运，两年后荷兰人屈服。禁运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郑氏海上集团使用“经济制裁”方式对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现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性质是一样的。书中不仅书“兴”，还书“衰”，郑氏集团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最后海权霸业终结，也带给我们很多教训。改朝换代牵制了这个集团在海洋世界的进一步作为，不但得不到官方支持，反成了官方剿灭的对象，不仅没有带动国家走向海洋贸易启动现代化开端，而导致中国官方固化闭关自守，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劣势，舰船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落后。这都值得我们深省。

海权与文明兴衰是紧密相连的。西方荷兰、英国等国家的海权辉煌带给了他们丰富的财富积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更容易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海权问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将会越来越关乎着我们文明的复兴，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也是今后历史的必然。目前，我们的骄傲还是来源于我们的陆军，对于海军的关注远远不如陆军。

所以《海权战略》是一个“借鉴”。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壮大海商、扫灭群盗，成就海上霸业，从收复台湾到最后明郑终结，其经验可贵，其教训可叹，俨然一部中国微缩版的海权文化“教科书”。

希望这部书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海权的重要性，让国家更加重视海权的战略作用。也希望张培忠能够再接再厉，凭借自己的学术理论优势，多着墨，继续写出更多具有国家意义的好作品。

张培忠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作家。长期致力于重新发现历史，而且也确实有所发现。他的上一部作品写张竞生，把一个被忘掉的人都已经死透了的人又给救活了。这种对历史的重新发现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每一代人的境遇、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回望我们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也扩展了对自身、对当下的理解。所以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否则只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够了？在重写中人们会不断有新的发现，达到对我们民族历史更为真切、更为宽阔的认识。张竞生是这样，《海权战略》就更是这样了。

当今时代，海权战略问题已经变成了尖锐迫切的大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能不能实施强有力的战略密切相关。所以，这部作品是写历史的，但有着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这部作品给我们展开历史的丰富复杂的景象。有时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很粗糙、很片面的。比如对郑成功的认识，我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他早期的抗清和后来的收复台湾。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发现，郑成功的业绩和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郑氏父子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其实在明代禁海之后，民间的海上活动就非常活跃，这种活跃某种程度上是15、16世纪世界贸易发展的结果，所谓“白银时代”，明朝政府不让出去，大量的民间商人出去，在正史叙述中这些人都是“海盗”，都是坏人。但现在看，当时的这些民间海商活动具有长时段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为后来我们的海上疆界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这是被正史遮蔽的大规模的历史活动，从中涌现出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这本书所揭开的历史景象是我们很不熟悉的，从日本到菲律宾，从东海到南海，我们的先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冒着巨大的压力、风险、困难，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还占了上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真当得起波诡云谲、波澜壮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向着未来的理想，但是，我们也需要从我们民族的过去中不断地汲取前行的力量。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读这本书《海权战略》，确实可以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汲取重要的历史经验。

张培忠不是专业史家，但他既有文学家的敏感、叙事才能、对人性的洞察，也有史学家的缜密、执著，无论是写张竞生，还是写这本书《海权战略》，都是下了死工夫的。这样一种肯下死工夫、肯下笨工夫的写作，现在也是比较少的，令人尊敬。说到底，这里还体现了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对我们民族历史的深切感情和虔诚珍重。

□李敬泽

重新发现历史

重塑郑成功

□胡平

张培忠潜心研究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得出郑家有潮汕血统的结论，并详细梳理了郑氏父子的生平事迹，又得到导师赠予的大量资料，使此书成为研究郑氏父子新的权威著作。它所采取的全新的学术视角，也使我们对于郑成功的认识有了新的认识。现在看，郑成功与其父都属于中国人中坚持开放通商、抵制闭关锁国政策的前驱。中国经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的确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贬抑商人。当商业文明真正到来时，这个上层建筑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顽固地拒绝改革开放，把海洋商贸视为洪水猛兽。张培忠具体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自朱元璋开国，就认为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会导致

沿海民众经常脱离政府管制，因富而生异心，因迁徙而生离心，危害政权的统治，颁布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以后，隆庆帝曾被迫部分开关，到崇祯帝又重新锁上国门。但海边的人们，经商意识比内地人更早发育，为求生存和发展，从未停止过违禁商贸。郑成功远比农民出身的帝王更能看出四通八达的趋势及远景，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海商集团与中央分庭抗礼，直至从武装的荷兰跨国公司手中夺回台湾。因此，张培忠所描绘的图景是和其他一些相关著作不同的，他看出了郑成功背后新的经济力量，指出了他所代表的历史方向，而不仅仅把他看作恢复国土的民族英雄。张培忠能写出一个作为海商集团首领的郑成功，与他自己便是广东人有关，他理解潮汕文化的本质。

《海权战略》是深藏文学性的传记著作，它不忘发掘郑成功性格的各个侧面，既写他的雄才大略，也写他的骄傲轻敌，以及不近人情等，刻画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人物，颇具文学价值，这种跨界写作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

以新的视角书写历史

□王山

历史是无比漫长和庞大的，历史既可以是一个民族沉重的包袱，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前行的动力。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以当下体验和语境为基础推衍出新的意义，历史是离不开人的判断的。由此作为诠释张培忠《海权战略》一书的切入口，我想是可以的。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往往是对某种价值的认同开始的。在当下语境中，张培忠《海权战略》的写作出版恰逢其时，意义非同一般。

因为，历史也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张培忠在过往的历史中发现了可以续接当下的价值，事关海权，事关强势与冒险，事关一个民族的血性与自尊。

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有其合理性。失去了当下语境的历史或许是无用的，甚至是无法存在的。我认为，张培忠的敏锐眼光、勇气以及他的投入，他所要表述的历史和价值，有助于让死的历史活泼起来，让沉睡的历史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一个令人振奋的参照点，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提供正能量。

在《海权战略》中，郑芝龙、郑成功的海商集团亦盗亦侠，亦商亦民亦军，抗清、降清、光复台湾……历史的真实、琐碎自成脉络，作者的逻辑、思辨隐约可见。

《海权战略》的切入点独特，叙事策略得当，作者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用非常明白晓畅的语言创造性地描述了郑氏海商集团的发生、发展、辉煌和没落，力求生动地再现郑氏父子叱咤风云的人生历程，作为中国人在蔚蓝色领域的狂飙突进，既突出了郑氏父子对历史进步的贡献，也不讳言他们的短视和软弱。作者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对郑氏父子做简单化的历史道德评判或概念化的歌功颂德。书中有许多出彩的记叙，比如郑成功以西法自铸银币，以战逼和，以时间换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以木船与荷兰当时最先进的战舰正面对抗并赢得胜利，光复台湾的壮举等等，都给人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

历史无情亦有情，历史的进步有时是以恶的形式和动机来实现的，以今人的角度看郑芝龙、郑成功当年的举止进退，也无需非要美化他们的行为动机。一切历史都是书写的歷史。

我有时在想，当我们的纪实文学创作取材于历史的时候，当我们在用逻辑对历史进行修正的时候，是否也要用文学对历史进行修正呢？这种逻辑修正和文学修正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相背的，是并行抑或有交集也有分离呢？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将历史道德化的重要性是否存在，还是仅以是否推动历史前进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这些困惑早就存在，充满了悖论和挑战，但迄今无解。有时候，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唐浩明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可能更接近历史。可否说，好的回望往昔的纪实文学可能更接近往昔，同时也更接近现实。

历史是现实的参照，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勇气、智慧和力量，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言说历史。在这方面，张培忠作出了有益可贵的探索。

唱响蓝色梦想

□孙丽生

收复台湾、通洋裕国的重大事件和悲壮战役，比较生动而全面的复原再现，让人深切感受到郑氏集团发事、兴起、消沉、再崛起、中兴、鼎盛、突变、没落、衰亡等触目惊心、慷慨悲歌的别样真相，大有抚古思今、以古喻今的喟叹，使我们想到而未说的话跃然纸上，能以史为鉴，强烈激发爱国情怀和强国梦想。由此来看，张培忠在纪实文学方面的创作功底、把握驾驭能力，正日益臻于老到娴熟，治学精神相当严谨扎实。

三

《海权战略》中的事件和人物，主要发生在长江口、舟山群岛、台湾海峡、澎湖列岛、漳州泉州、金门厦门和广东南澳、饶平、潮州、揭阳、潮阳、惠州以至东南亚地区。书中主线主调，立足演绎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况、海事和海防、海权，极力彰显所涉及的地方特色。同时，张培忠作为生长于饶平县的广东本土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修为涵养和地缘认知优势，把广东沿海尤其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乡土风情，包括红头船、番薯、功夫茶、乡间练武习俗等特色元素，巧妙糅合到相关的事件与情节中，营造了突出的粤味风格、岭南气派。让广东以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读者，备感亲切可信。

四

报告文学，也可调过来叫做文学报告，当然还有别的说法。但不管给予什么样的称谓，这种文体的本质要求，就是以文学的思维、方法、技巧、形象，真实报告特定时代富有价值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而作家，与当下国家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是时代所造就的，只有坚持“两”方向，才可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张培忠步入文坛之后，素以报告文学见长，颇有成功之作。从《海权战略》这部新作不难看出，他能够铭记作家责任，勇于担当文学使命，与人民同步，与时代同行。众所周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的土地等重要资源量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值，未来发展必然寄希望于海洋，向海洋找出路要资源，必须加强海洋的探测、开发、监管、保护。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察世情、顺民心、集民智，更加注重于建设海上力量，更加着力于海上维权。在此大背景下，张培忠创作《海权战略》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善举。书中，他不止一次不厌其烦地阐述“海权兴国安邦”等相关道理，用大量的史料事实予以佐证，并披露了我领海资源屡遭侵略掠夺、海防海权屡遭践踏蹂躏的惨痛教训。这就紧紧扣住了时代主题，让人更加关注我们300多平方公里领海的命运，并注意到许多不同势力正在觊觎我们的蓝色国土，盗采那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宝贵资源，盗取我海洋文物。从而激起大家思想觉悟，认识到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包括海洋强国梦，促使大家唤醒海权意识，告诫大家勿忘海上国耻，号召大家矢志唱响蓝色梦想，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完全可以这么说，写《海权战略》有可贵的历史价值，读这本书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春声

在「世界体系」与「朝贡体制」之间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变迁，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我们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一书的启迪与价值。

(《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张培忠著，花城出版社出版)